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织编写

康沛竹 主编

中国近现代史 前沿问题研究

ZHONGGUO
JINXIANDAISHI
QIANYAN
WENTI YANJIU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织编写

康沛竹 主编

中国近现代史 前沿问题研究

ZHONGGUO
JINXIANDAI SHI
QIANYAN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现代史前沿问题研究 / 康沛竹主编. —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2.4

(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问题研究丛书)

ISBN 978-7-212-05192-1

I. ①中… II. ①康… III. ①中国历史: 近代史 - 研究 ②中国历史: 现代史 - 研究 IV. ①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8408 号

中国近现代史前沿问题研究

康沛竹 主编

出 版 人: 胡正义

丛书策划: 胡正义

责任编辑: 吴 筠 杜宇民

装帧设计: 王国亮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八楼

邮编: 230071

营销部电话: 0551-3533258 0551-3533292 (传真)

印 制: 合肥精艺印刷有限公司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9.5

字数: 330 千

版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2-05192-1

定价: 4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李捷

研究历史现象、历史问题,往往需要变换角度来看。每变换一个角度,就会对同一历史现象有新的认识,使研究深入一步。中国近现代史也不例外。

对于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可以从时代主题变化的角度来研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前后两个时代的分野。向前看属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畴,研究中国近代以来的各派政治力量及其代表人物,是怎样围绕时代主题提出各式各样的救国方案,又怎样将一个又一个的救国方案付诸实施,而最终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选择了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唯一正确道路,最终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两大历史任务的。向后看属于中国现代史研究的范畴,研究中国共产党是怎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确立起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是怎样历经艰辛而曲折的探索,包括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失误,最终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

对这段历史,换个角度,也可以循着思想发展史的脉络来研究。那就可以以五四运动为分界线,在这以前,着重研究各种西方思潮是怎样循着不同的路径传到中国,在中国思想界和社会产生日益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并产生一个又一个的社会运动。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和五四运动的爆发,最终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以后,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逐步从幼稚走向成熟,其标志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开辟,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出现。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并

2 中国近现代史前沿问题研究

不平坦,中间经历过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严重曲折和失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出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除了上述两个角度,还可以选取许多角度,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进行深入研究。同时,还可以把两个以上的角度结合起来,相得益彰。总之,在同一研究领域中,不断转换研究的视角,运用得好,可以使我们的认识更加全面起来,更加辩证起来。正所谓“条条大道通罗马”。

康沛竹教授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史前沿问题研究》,就是这样一部用不同视角研究中国近现代史问题的专著。

全书的前三章,为我们展示出一个内忧外患的清末民初社会图景。中国旧式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和新式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作者以翔实的历史资料告诉我们,灾荒频发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特点,这种自然现象与官府黑暗、社会腐败交织在一起,可以说是天怒人怨,雪上加霜,造就了晚晴社会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相互激荡的革命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不革命没有出路,就连以保皇、改良、维新、立宪自诩的温和人士,也不能不投入革命营垒以求出路。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不是人为的,更不是主观想革命就能革命的,革命是形势逼出来的,是大势所趋。中国最终走上辛亥革命道路,进而效法十月革命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并非偶然,完全是各种力量相互较量、相互作用、相互推动的结果。正如当年毛泽东对革命道路作痛苦的选择时所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①

历史发展总会有令人扼腕兴叹之处,总会有阴差阳错的时候。人们在感慨之余,也往往情不自禁地去做种种假设。这是可以理解的。例如,面对辛亥革命的结果,有人会问:假如晚清政府的立宪改革成功,历史又会是怎样?面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统治的覆亡,有人又会问:假如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不打进中国来,假如蒋介石的对手不是毛泽东,历史又会是怎样?其实,正是在诸多历史偶然性的背后,隐藏着历史的必然。为什么这些假设并没有变成历史的真实?不是别的什么原因,就是在社会进步与倒退、光明与黑暗的反复较量中,历史的必然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4页。

性通过种种偶然的历史现象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在于,这种历史必然性并不是一定会如此,更不是历史注定如此,如果那样的话,历史的发展岂不是简单又简单,笔直又笔直。历史必然性在开始的时候,往往表现为历史的可能性,要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就必须经过种种的曲折,把握好各种偶然事件,渡过重重难关,化险为夷,将挑战化为机遇和动力,才能达到成功的彼岸。成功越大,经历的风险越大,经历的挫折与失败也会越大。但无论遇到多么大的艰难险阻,经历多少曲折反复,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新生事物,一定会最终战胜阻碍历史发展进步的腐朽事物。这才是历史的辩证法。我们在作种种假设的时候,千万不要把历史假设当成历史现实,而要透过历史现实与历史假设的反差,深入思考为什么会必然如此的道理。这才是历史研究的科学之道。

接下来的五章,即第四章到第八章,作者深入探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几个重要方面。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早期传播,到第一次国共合作前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斗争,再到土地革命初期创建红军过程中对所谓“土匪武装”的改造,直至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间力量的争取,作者都结合翔实的历史资料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作者还转换了一个视角,对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对于三民主义的重新诠释及其“新生活运动”等加以论列分析。这就使我们联想到中国共产党人探求建设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努力。毛泽东同志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里,以经过孙中山先生重新阐释的包含“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为分界,将三民主义区别为新三民主义和旧三民主义,并且说:“离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是没有前途的。”“语曰:‘识时务者为俊杰。’我愿今日的三民主义者记取此语。”^①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抛弃了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精髓的三民主义,最终没有能够挽救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厄运。同样是文化建设,结果却如天壤之别。这验证了孙中山先生说过的一句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历史也讲平衡,历史也有对称。要想取得巨大的成功,就要准备付出惊人的代价。要想总是一帆风顺,轻而易举地取得成功,只能是幻想。中国共产党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经历了两次大的挫折,犯了三次“左”倾错误和两次右倾错误,才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92、693页。

4 中国近现代史前沿问题研究

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同样地,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在取得宝贵经验和辉煌成就的同时,也经历了两次大的失误。一次是严重违反经济规律的“大跃进”,另一次是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其中的教训,刻骨铭心。唯有如此,中国共产党终于带领人民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这部专著的最后三章,讲述的就是后面这段历史。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告诉我们,即使是毛泽东同志这样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战略家,只要在思想路线上偏离了实事求是,在政治路线上偏离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样也会背离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也会犯全局性的错误,也会给党、国家、人民带来严重损失。这段历史还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无愧于伟大、光荣、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因为,她勇于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纠正错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正是在总结经验、纠正错误、探索规律的过程中,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进行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鉴往知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还有许多已知和未知的风险挑战。每当我们遇到难题的时候,重温已经走过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可以使我们信心百倍。每当我们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重温这段历史,可以使我们头脑清醒。我们要以敬畏之心尊重自己的历史,唯有如此,才能使自己更加充实、更加智慧、更加理性。

是以为序,是以为贺。

2011年11月12日于北京西城前毛家湾

目 录

序 言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李捷/1

第一章 近代中国灾荒与社会/1

- 一、近代中国灾情/1
- 二、灾荒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4
- 三、灾荒发生的社会因素/13

第二章 近代中国的改良与革命/26

- 一、“革命”与“改良”概念释义/26
- 二、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改良与革命/30
- 三、关于“改良”与“革命”/39

第三章 民初议会政党政治的崩溃

——以国会和进步党为中心/52

- 一、袁世凯非法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致国会停会/53
- 二、国会停会初期进步党维持国会的活动/59
- 三、熊希龄、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主导内阁成为矛盾中心/61
- 四、进步党分裂为国会派和内阁派/63
- 五、国会解散/66
- 六、进步党的瓦解/69

2 中国近现代史前沿问题研究

第四章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72

- 一、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起点/72
- 二、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特点与文化基础/90
- 三、李大钊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题/100

第五章 1921—1927 年中共对反帝斗争的领导/105

- 一、揭露国际帝国主义的侵华阴谋,提出彻底反帝的纲领及若干重大原则/105
- 二、在收回关税余款和平定商团叛乱中,从政治引导和组织民众支援等方面发挥领导作用/112
- 三、领导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积累反帝斗争的宝贵经验/114
- 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大沽口和抗议帝国主义武力干涉北伐战争/118
- 五、指导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和揭露帝国主义分化革命营垒的阴谋,总结反帝斗争的经验教训/121

第六章 红军的创建

——以土匪问题为中心/126

- 一、收编土匪武装是建军初期迅速壮大红军的重要手段/127
- 二、改造土匪武装——六大的严厉政策和红军实践中的变通/136
- 三、清洗——信仰力量转化为组织力量/144

第七章 20 世纪 30 年代三民主义文化思潮/154

- 一、对三民主义的重新诠释/154
- 二、三民主义文化思潮的推动/166

第八章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中间力量的关系/189

- 一、对“中间力量”的界说/189
- 二、中国共产党对资产阶级的政策/200
- 三、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合作关系/212
- 四、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争取/216

第九章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224

- 一、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条件/225
- 二、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工业化道路/227
-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初萌芽/230
- 四、政治变革引导经济变革：赶超战略的实施和历史经验/235
- 五、“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和大科学机制的确立/246

第十章 改革开放序幕的揭开/259

- 一、1974—1975 年的全面整顿：为改革奏响先声/259
- 二、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启动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261
- 三、开展其他多方面的工作：为改革开放序幕的揭开进一步创造条件/265
- 四、为期 36 天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268
- 五、正式揭开改革开放序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271

第十一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层民主自治建设/274

-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层民主自治建设的主要历程/274
- 二、我国基层民主自治建设的主要内容和成效/287
- 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层民主自治建设的主要特点和意义/292

后 记/300

第一章 近代中国灾荒与社会

人类自产生以来,便没有一刻摆脱过灾害的侵袭与困扰,人类就是在同自然灾害不断斗争的过程中发展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的国家,“一岁一饥,六岁一衰,十二岁一荒”是历史的真实写照,而“饥民遍野”、“饿殍塞途”、“人相食”等描述灾荒肆虐的字眼几乎浸透在每一页史书中。1840年以后,由于封建统治的日趋衰落,帝国主义的大肆侵略,社会动荡,经济凋敝,国穷民贫,使本来就很薄弱的防灾抗灾能力更加低下,自然灾害带来的灾难也更加严重。

一、近代中国灾情

中国一向重史,各种史料浩如烟海,在大量的史料中,有关灾害的资料可以说汗牛充栋。早在甲骨卜辞中,有关灾害的内容就占相当多的比重。自《汉书》设“五行志”专篇记载灾异,此后,一直到《清史稿》,历代基本上没有间断。此外,方志、实录、档案、农书、文集、笔记、日记、诗文、牒谱、报刊、碑刻等多方面的记载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翔实的资料。近代中国是灾荒频繁发生的一个时期,有关资料可谓汗牛充栋。1990年出版的《近代中国灾荒纪年》在梳理大量原始资料尤其是清代档案的基础上,以编年体形式,对历年全国各省区灾情予以较为详细、具体的描述,使我们对晚清灾情的了解和研究更加便捷。李文海先生在该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一旦接触到那么大量的有关灾荒的历史资料后,我们就不能不为近代中国灾荒的频繁、灾区之广大及灾情的严重所震撼。”

频率高正是近代中国灾情的重要特点,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先引用一下前人的研究成果。邓云特(邓拓)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救荒史》中指出:“我国灾荒之多,世罕其匹,就文献所可征言,则自西历纪元前十八世纪,直至纪元后二十世纪之

2 中国近现代史前沿问题研究

今日,此三千数百余年,几于无年无灾,从亦无年不荒;西欧学者,甚有称我为‘饥荒之国度’(The Land of famine)者,诚非过言。”邓云特在对我国灾荒频数进行研究时,还引用了几位学者的研究成果。一位是马格龙(D. H. Mallong)的统计,“我国自公元前108年至纪元后1911年止,共有1828次灾荒”。何西(A. Hosie)的统计结果是“自西元620年至1643年,共1023年间,受旱灾约612年,平均计算在两年中即受害一年”。竺可桢“统计我国本部18省自西元一世纪至十九世纪,水灾凡658次,旱灾凡1013次”。陈达“统计我国自西元前206年至1936年,共2142年间,有1031年水灾,计每百年有48年水灾;又在同时期中,有1060年旱灾,计每百年有49年旱灾”。据邓云特统计,“自西历公元前1766至纪元后193年止,计3703年间,共达5258次,平均约每6个月强即罹灾一次。若仅就旱灾而言,则此3703年间亦达1074次,平均约每三年四个月强即罹一次;又仅就水灾而言,则此同时期中所发生者,亦达1058次,平均每三年五个月即罹一次”^①。

从1840年到1919年短短的80年中,可以说是连年遭灾,岁岁都是灾年。40年代,黄河连续决口;紧接着发生秦豫大旱,随后又是连续3年的东南各省大水灾。50年代,旱蝗严重,瘟疫流行,黄河改道;60年代,以水灾为主,永定河多次决口;70年代,北方持续大旱,“丁戊奇荒”惨绝人寰,甘肃发生大地震;80年代,发生全国性大水灾,黄河连年漫决,世纪之交则干旱严重,赤地千里,等等。

在各种自然灾害中,水灾是最常见且危害最大的一种。在我国,水灾主要集中在黄河、长江、淮河、永定河等河流的流域范围。黄河是我国第二大河,历史上也是决口、泛滥最多的一条大河,有道是“华夏水患,黄河为大”。历史上有记载可查的黄河大决口即达1500次左右,大的改道有26次,正是“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位于黄河岸边的古都开封历史上曾经6次被黄河水淹没。时至晚清,黄河“愈治愈坏”,如《清史稿》所说“河患至道光朝而愈亟”,水患越来越严重。鸦片战争爆发后,黄河1841年、1842年、1843年连续三年大决口,河南、安徽、江苏、山东、湖北、江西等省遭受黄水之灾;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此时,清政府正忙于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农民起义,无力堵筑,只得任黄水四处横流,豫、鲁、直三省的许多州县成了黄水泛滥的区域,致使黄河改道;光绪朝中期,黄河连年漫决,其中1904年发生特大洪灾。据统计,1840年至1911年,黄河较大决口的年份正好占了1/3,

^①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50—51页。

有的地区几乎连年决口,有的年份几处同时或先后决口。

我国第一大河长江,从历史上看,就水患程度来说,要轻于黄河,正如魏源所说:“历代以来,有河患无江患。”^①但在近代以后也发生多次洪水。“数十年间,告灾不辍,大江南北,漂田舍、浸城市,请赈缓征无虚岁,几与河防同患。”^②近代中国长江水灾日益剧烈,则是不容忽视的客观事实。据统计,近代中国长江发生30多次漫决,其中有1860年(咸丰十年)、1870年(同治九年)、1882年(光绪八年)等三次是大洪水。1870年的特大洪水是长江“自1153年以来800余年调查到的洪水的首位,宜昌站洪峰流量为 $10.5\text{万 m}^3/\text{s}$ ”^③,这在当时是无法抗御的。位于京师附近的永定河,据统计,发生漫决33次,平均近两年一次^④,其中,同治年间连续9年决口11次,漫决频率之高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其他比如说淮河、辽河、珠江、海塘等也是经常溃决,泛滥成灾。晚清时期,还发生了全国性的大水,即1889年(光绪十五年)中国腹地的主要省份四川、云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浙江、直隶、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广东等省遭受大面积水灾。1915年的珠江发生大水,“珠江三角洲18个县市受灾农田达647万余亩,受灾人口378万余人,死伤10万余人”^⑤。

与水灾不同,旱灾的形成往往经数月乃至更长时间显现。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旱灾的危害决不亚于水灾。一般来说,文献中多用“春旱”、“夏不雨”、“秋旱”、“某月旱”、“旱蝗”等一类词汇记述的则为一般干旱。大旱范围较大,连季旱或跨年度干旱,文献中多用“大旱”、“岁饥”、“饥民流徙”等词汇记载。旱区超过一省甚至遍及几省,其中重灾区受旱面积超过一半以上,干旱持续两年或两年以上,有“赤地千里”、“人相食”等描述的,就应属特大干旱。在我国,由于水资源分布是东部多、西部少、南方多、北方少,自古以来北方和西部旱灾比较严重,有“三年两头旱,五年一大旱”的说法。晚清时期,连年都有干旱的记载,而1846—1847年的秦豫大旱、1876—1879年的“丁戊奇荒”、1899—1901年北方的持续干旱都算得上是特大干旱。其中,光绪初年发生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旱荒,由于这次灾荒以1877年、1878年为主,而这两年的阴历干支纪年属丁丑、戊寅年,所以时人称之

① 魏源:《魏源集》(上),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88页。

② 魏源:《魏源集》(上),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88页。

③ 陈雪英等主编:《长江流域重大自然灾害及防治对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页。

④ 李文海、周源:《灾荒与饥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6页。

⑤ 夏明方、康沛竹主编:《20世纪中国灾变图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为“丁戊奇荒”。这几次特大干旱,其发生间隔只有二三十年,周期是相当短的。之所以如此,恐怕与晚清时期北方的社会经济条件如水土保持、抗旱措施以及社会环境诸因素有很大的关系。

自然灾害在成因上往往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它们或者源于同一或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先后发生,或者互为因果关系。旱灾与虫灾的发生经常就是连在一起的,虫灾发生的频率在我国历史上是仅次于水、旱灾害的,与水灾、旱灾并称为中国三大灾种,其中,蝗虫的危害最重。据统计,从前 207 年到 1935 年,全国发生大蝗灾 796 次,平均三年一次。^① 此外,干旱与地震也有一定的相关性,据一些地震工作者研究,中国历史上 6 级以上地震有 378 次,震前出现严重旱情的有 373 次^②,晚清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大震即甘肃大地震就发生在 1879 年“丁戊奇荒”之后。此外,水、旱、地震等自然灾害还往往带来瘟疫等次生灾害。瘟疫是一些烈性传染病如天花、鼠疫、霍乱、麻风、斑疹等的总称,瘟疫的发生与气候、环境、自然灾害、战争、卫生条件等有很大关系,由于它的发生和流行是上述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又与人类自身的行为密切相关,因而也将之归为灾害。近代中国,由于自然灾害和战争频繁,随之而来的瘟疫也十分严重,不仅持续时间较长,波及面积也较大。

二、灾荒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在人类产生以前,地球上就存在着地震、洪水、干旱等自然现象。只有当这些自然现象与人类发生联系、对人类社会造成损害时,才被称其为灾害。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遭受着各种灾害的打击,灾害与人类文明是相伴随的,世界上许多关于文明起源的传说以及一些文明的衰落都是与灾害联系在一起的。古往今来的历史告诉我们,灾害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而且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灾害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就近代中国而言,由于抗灾能力的薄弱,自然灾害对社会造成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

(一) 造成人口大量死伤

人口死伤历来就是各种灾害造成的最直接后果。晚清时期,几乎每次自然灾害都造成相当数量的人口死亡。尽管许多记载是“死者无算”、“尸横遍野”等定性

① 郑功成:《中国灾情论》,湖南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69 页。

② 郑功成:《中国灾情论》,湖南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7 页。

词语,因此我们很难准确地计算出每一次灾害所造成人口死亡的数字,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下面的一些例子中了解到当时的情形。

水灾造成的人口死亡比较集中,经常是大水一来,淹死无数。据载,1885年,两江两湖两广大水成灾,其中“湖南省城西关外,水与屋齐,城内半通舟楫……常澧一带,淹毙万余人”^①。1888年夏,直隶境内大雨连绵,山水暴发,永定等河漫决,“淹毙人口甚众”,“如离京二十二里芦沟泛之水灾,实淹死居民二万有奇”。^②还有1906年湖南发生大水,数百里间,一片汪洋,据记载,“淹毙不下三万”。^③至于类似“尸浮如萍”、“淹毙人口不知凡几”的词句在水灾后的各类记载中随处可见。瘟疫的蔓延,更是由于其流行的大范围性和死亡人数的众多,而制造出许许多多的人间悲剧。晚清时期,鼠疫、霍乱、伤寒、疟疾等烈性传染病往往造成大规模人口死亡,其中1910年东北鼠疫,死亡“达五六万人之谱”。^④

晚清历史上,有几次较强地震,其中,1850年四川西昌发生强烈地震,据《中国地震目录》判断,这次地震,震级为7.5级,当地官员奏报,西昌城内外,“压毙男妇二万六百五十二名口”。1879年甘肃大地震,山崩地裂,据《中国地震目录》判断,此次地震为8级,“有三万余人罹难”。^⑤另外,像冰雹、雪灾、泥石流、滑坡等灾害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人口死伤。

因灾导致饥饿、疫病而死亡者也是不计其数,“人皆相食”、“尸骸遍地”的记载在史籍中屡屡出现。“丁戊奇荒”发生之时,长期干旱致使粮荒异常严重,由于救济不力,大批灾民活活饿死。《申报》曾刊登了一份1878年抄录的《山西饥民单》,描述了饥荒之时饥民的凄惨状况。另一个重灾区河南也差不多是同样的情景,“流民络绎,或衰泣于道途,或僵卧于风雪……其地非特数皮草根剥掘殆尽,甚至新死之人,饥民亦争相残食”^⑥。其他如直隶、山东、陕西等灾区莫不如此。在这场持续几年之久的大饥荒中,据不完全统计,因饥、饿疫病而死者,达1000万人以上,陕西、河南等重灾区的死亡率在半数以上。灾区各县方志在记录这段历史时“民死

① 李文治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23页。

② 李文海:《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513—514页。

③ 《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④ 李文海:《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784页。

⑤ 李文海:《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03页。

⑥ 参见1878年2月14日《申报》。

十之七八”、“户口损三分之二”、“户口已减十分之六七”之类的词句频频出现。1920年华北5省大旱灾,大饥荒中北方5省的灾民总数在3000万人以上,饿死50万人。^①

(二) 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水灾、风灾、雹灾、地震等,除了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外,还往往冲塌、摧毁、砸坏房屋建筑,毁坏道路、桥梁,造成物质财富的巨大破坏。比如,1848年湖南大水,“全省淹没田庐人畜不胜计,各种农副产品荡然无存”^②。1882年黄河在山东境内决口,到处一片汪洋,仅济阳“冲塌房屋40300余间”^③。1879年,甘肃大地震发生后,据统计,阶州四乡房屋毁坏20%~60%,西固各处房屋倒塌80%。^④另外,地震往往引起水灾、火灾、滑坡、泥石流、海啸等,还有瘟疫等衍生灾害,而且,有的次生或衍生灾害甚至不比地震本身的危害小多少。大量物质财富的被毁,极大妨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也影响了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

近代中国每年都因各种灾害的侵袭导致大量土地荒芜、粮食减产。大水灾时,一片汪洋,大量田地被淹,地里庄稼或被冲失,或浸泡霉烂,从而造成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大水过后,水淹土地的土质受到破坏。由于大量碱性化合物分解以及土中氮、磷、钾等养分的丧失,水退之后,地面留有一层白色沉淀物,难以去除。而且,大水中含沙较多,尤其是大河决口、改道,所经地面多变为沙碛,农作物无法生长。比如说,1841年、1843年黄河两次在河南境内决口,“膏腴之地,均被沙压”,一直到十几年后,自祥符至中牟一带,仍“地皆不毛”。^⑤干旱对农作物的危害,轻则减产,重则绝收。长期干旱还会导致土地沙化,变成不毛之地。虫害对农业的危害方式主要是直接取食作物。晚清时期,蝗灾频繁,尤其是咸丰朝,是发生蝗灾最集中最严重的一个阶段,时人记载当时飞蝗遍地时“飞蝗蔽日,翅戛戛有声”。可见,蝗虫对庄稼的危害相当大。另外,灾荒中人口的大量死亡,农具、耕畜的丧失,必然导致土地荒芜,农业生产衰退。比如,“丁戊奇荒”后,据山西地方勘查,由于人口大量死亡,全省5647万余亩耕地中,有2200万成为新荒地,即有地无主者,还有大

① 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② 李文海:《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75页。

③ 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档》,光绪十六年六月初九李鸿章折。

④ 李文海、周源:《灾荒与饥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页。

⑤ 李文海、周源:《灾荒与饥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1页。

量的有主但无力耕作的“暂荒地”。广大农民因灾后缺乏耕牛,根本没有办法恢复生产。

(三)对晚清政局的影响

几乎每一次大灾之后,都会造成大量人口的流移,而大量饥民、流民的产生,无疑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民人流散之日,便是社会动乱之时。饥民、流民、游民的数量往往是检测一个王朝或政府稳定程度的晴雨表。近代中国,灾荒频繁、严重,灾民动辄几十万、几百万以至上千万。无以为生的贫苦人民四处逃荒乞食,每每形成庞大的流民群体,几乎连年又都有相当数量的流民拥入城镇乞食求生,加入愈来愈多的游民队伍中去。这样大量的饥民、流民、游民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封建统治的严重威胁,再加上接连不断的“平米价”,抢米、“吃大户”、抗粮、抗捐、抗租、闹灾等形式的灾民斗争更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这些无疑大大激化了社会矛盾,促进了农民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形势的成熟。

回顾我国历史上发生的农民起义,从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汉代的绿林、赤眉起义,到隋末、唐末、元末以至明末李自成起义,无论其时间长短、范围大小,无一不是以灾荒为背景。晚清时期的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尽管不可避免地有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印记,与上述农民起义相比有一些不同特点,但无论是太平天国运动还是义和团运动,与灾荒之间的关系确实实是存在的。

太平天国运动发生于19世纪中叶,正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广西之所以成为这场运动的策源地,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僻处南疆的广西是一个多山的地区,距全国的政治中心北京和经济最发达的江浙十分遥远,是全国经济上最为贫穷的省区之一,文化也较落后。在封建政府、贪官污吏及地主的沉重剥削和压迫下,人民生活十分困苦。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变化又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问题,使得各种矛盾更加尖锐、突出。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早已成为天地会活动基本地区的广西爆发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就不足为奇了。值得注意的是,在分析太平天国为什么发生以及为什么在广西发生的原因时,还必须注意灾荒所产生的影响。太平天国发生前十年,正是全国包括广西自然灾害频发时期。仅以广西为例:1840年,浔州大旱,武鸣大水,藤县风灾,全州大疫;1842年,玉林、北流、陆川雨雹,苍梧大水,上林旱,全州蝗灾;1843年,罗城县水、旱交加,容县疫,玉林、北流蝗灾;1844年,滕州、罗城大水,全州疫;1845年,临桂大雨,柳城由